



第 1756 号 本期八版 2019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一

庸叟其实无缘庸

——忆父亲钱剑夫先生与他的五位“贵人”

钱定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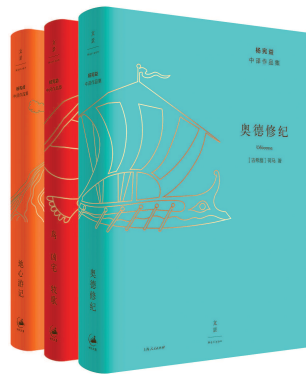
钱剑夫(1915—2002),湖南常德人,我国经济史学家、文字学家。曾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、代局长,上海市银行总经理。1978年后,任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特约研究员,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、分卷副主编,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。长期从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,撰有《秦汉赋役制度考略》《秦汉货币史稿》《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》等专著及《洞庭湖的经济价值》《唐代的官僚资本》等论文百余篇。

图为钱剑夫先生(摄于上世纪90年代末)及其部分专著。

阅读前沿

陈尚君——讲清杜甫离开草堂的理由
王宏图——远方的诗意与凶险
苏扬——从家书看梁启超的理财观
蒋狄青——重回地中海：荣光、黯淡与思索

每周一书



《杨宪益中译作品集》

杨宪益译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定价(已出三卷):213元

杨宪益是我国首屈一指的翻译家,被誉为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。《杨宪益中译作品集》(全五卷)收录《奥德修纪》《鸟》《凶宅》《牧歌》《地心游记》《罗兰之歌》《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》《卖花女》《近代英国诗钞》等作品,上至西方文明发源的古希腊时代的史诗、戏剧,下至近现代欧洲工业文明崛起之后的新式文学体裁——科幻小说及现代诗歌,可谓时跨古今、无所不包。杨先生的译本成稿虽早,却久经淘洗,自问世以来便哺育了一代代读者。译文既紧密贴合文本原意,保留其本身的风格样貌,又充分考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理解习惯,在还原性和可读性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,是“名家名作名译”的三重结合。

家父钱剑夫,原名鼎元,又改名健夫,晚年自号“庸叟”。其实,他一辈子与“庸”无缘。前些年我应邀回家乡湖南省常德市,当地报章竟称:“常德神童的儿子回来了!”此“常德神童”,即指家父。

常德有神童
读书一种子

先说一下神童称呼的缘起。

家父小学三年级时,学校规定放学前要对对子,对子字数与年级数相同。

那天很冷,老师出题“天欲雪”,父亲不假思索对曰:“人思春。”笑谈就此传开:七岁小子懂何“思春”?其实此“思春”非彼“思春”。但说明,家父小小年纪已懂点儿“主动宾”结构了。

进了中学,家父未读到毕业,时任常德国学专修馆馆长的先祖父毅盒公命他去接受书院教育。书院,彼时正日薄西山,家父却秉承父命,扎实地把经史子集“搵”了一遍。他的这一功夫之“扎实”,有“例”可证。

家母去世后,家父晚年很是寂寞。我回国后常去看他,聊聊天,谈谈“蓬莱旧事”。不知怎地,那天忽想测一测他老人家的学问到底有多深。

我从书架上随意抽出《论语》《史记》《孔丛子》和《杜甫全集》,又随意从各书中拈出词句,没想到,家父基本上能答出上下文。也许是“同乡”的缘

故,他对《离骚》特别熟悉,能大段大段地背诵,而且是湖南的文白。

有一次,我想找一位“冷僻”的诗人来为难一下老先生,便选了清朝黄景仁的“似此星辰非昨夜”,岂料老人随口便来:“为谁风露立中宵!”至此,我彻底拜服。这也是我后来写包括黄景仁在内的随笔集《千古风流浪淘沙》的契机。

家父自小喜欢舞文弄墨,颇富文采;且练得一手好字,小篆、魏碑和大小楷书兼长。当然早就为文学创作而技痒,从三五少年时就写诗,写骈文四六体,特别写文言的或白话的小说。十几岁青年稚嫩的作品居然经常见报,也算不辜负这神童二字了。

落花生相招
香江“落花”生

家父在语言方面颇有天赋,他说长沙话(湘方言,与属于官话区的常德话不同)、重庆话和英语都很挺括(沪语,很专业)。

因为先外祖蒋国经将军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,家里颇有点日本氛围。先外祖颇看好这位自己相中的大女婿,所以鼓励他学了点日语。大概也和黄仲则当年觉得自己生于南方,缺少“燕赵之气”一样,那年,他出发了,却奔向当时并不发达的英属香港。

这时,出现了家父生平第一位贵人:以笔名“落花生”享誉“五

四”文坛的许地山先生。

在家父搞他稚嫩的“新文学”创作时,就曾和许先生鱼雁往返。恰好,1935年经胡适推荐,许先生就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,当即写信给家父让他去港大。这时,家父的国学腹笥颇符合许先生的要求,就先旁听了一段时间。后来,许先生觉得可以转为研究生了。可惜,旋即出现了一只拦路虎:许先生的研究生须修梵文,以便将来转向佛学研究。家父实在不愿意舍弃国学而去学梵学,考虑再三,只得依依惜别——大概也讲了一些鲁迅先生对藤野先生讲过的那些话吧。

1985年,我从美国游学回来,港大请我去当客座教授讲授“计算语言学”。我跟同事们说起这件事,他们都称是“父子同校,辈分颠倒”的趣事。

家父当时住在港岛的摆花街,可惜要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了。在为《文汇报·笔会》写的《香江文化随笔》中,我谈到过这条街的今貌。

生平治学杂
博览却有序

回到湖南,家父才发现,和“英国绅士”许先生相处,在港大那种浓厚的学术环境里经过一番熏陶,使他在追求文学之上,更添了一点学术憧憬:学习和研究理论的冲动洪波涌起。

当时,他在长沙一家报馆担任编辑,同时还在湖南大学听自

己感兴趣的一些课程,他自己称之为“杂学”。

为了就业、进修、读书,他把新婚的妻子留在常德老家,自愿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
抗战爆发后,家父回到家乡,转行进了当地政府的财政部门,也就有了研究经济和财政的机会。

这时,他的第二位贵人出现了:胡善恒先生。

胡先生,字铁崖,湖南常德人。先生出身北大,在日本和英国留学,著名财政学家。当时,他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。家父从常德的战时财政情况出发,拟定了一个宏大的“改革计划”,寄给了这位厅长。

也是机缘到了,胡厅长读后大为欣赏,当即把家父调到省府财政厅任要职。从这时开始,他有10年时间都在财经部门工作,就地取材,近水楼台,研究起财经问题,写了不少文章和论文,杂而有致。以至于抗战胜利后马寅初先生出版《财政学与中国财政》一书,其中称道家父为“中国著名财政学家”(大意)。其实,这位并未谋面的“学家”只是一位三十出头的财政职员。这是后话。不久,颇受蒋介石看重的胡先生调任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会计处长,也把家父和我们全家带去了。胡先生不但学识渊博、办事干练,还喜奖掖后进,为人极好。记得家母因沿途流离颠簸小产,正当严寒时节,胡先生竟双手捧着炭火炉子,一路步行送来我家!(下转第二版)